

我国奖项泛滥遭遇信任危机

奖项: 滥了、乱了、烂了?

最近关于深圳市政府向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热议,马化腾的个人财富近300亿,却依然领取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每月3100元的“购房贴息”,这在有点违背常理。

实际上,这样的政府奖励绝非孤例,此类官方稿费几乎泛滥成灾:

200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授予张艺谋、李宇杰突出贡献奖,分别奖励100万元,表彰两人对北京奥运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

政府重奖企业的更是多如牛毛:

今年9月,广东佛山三水区政府隆重举行“自主创新和大做做强突出表现企业表彰会议”,给予好帮手公司110万元的重量。

2008年,江苏省政府拿出了4600多万元,奖励省内203家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称号的企业。

攀枝花市有个机构,因为种植“攀枝花花

果”,申报成功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也获得了市政府50万元重奖。

类似这样的由政府出钱,补贴或者奖励当地的成功企业及其骨干的做法,已蔚然成风。这样做说起来似乎有理:这些企业贡献了就业与税收,为社会造了福,为当地争了光,政府应予鼓励重奖。

重奖背后是政绩工程

不过这种貌似合理的做法却仅仅是中国特色,并不符合“国际惯例”。

对于北欧小国芬兰来说,诺基亚可谓是这个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它占了芬兰国内生产总值的1.5%。诺基亚及其子公司为530万人口的芬兰提供了6万个就业机会,芬兰引以为傲的研发投资,有1/3的经费,来自诺基亚。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巨奖重奖这个企业,或者重奖诺基亚的老板、科研人员。

再看看比尔·盖茨,他对美国的贡献要远远大于马化腾对区区一个深圳的贡献吧,但是,即便获得美国国家技术奖的比·盖茨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块铜制奖牌,唯一的“实惠”就是在白宫和总统握手合影,没有一分奖金。这个奖章由国会于1980年设立,1985年首次颁发,主要授予那些具有美国式创新精神,并在提升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方面有着杰出表现的美籍公民或者美国机构,以表彰其在促进技术应用、提高就业率、改善生产力水平以及刺激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贡献。

此外,美国还有一项专门针对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奖项,那就是美国总统学者奖。该项目始于1964年,用以选拔和表扬美国最杰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每年最多可有141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获得总统学者奖。获奖者将免费受邀参加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家荣誉周活动,并在白宫主办的颁奖仪式上接受总统学者奖奖章,但是也没有一分钱奖金。

难道美国和芬兰等这些国家的政府没钱奖励人才吗?当然不是。这涉及首先就是权力是否受到制约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拿出纳税人的钱奖励任意公民,首先遇到的就是合法性的质疑。对于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而言,要花钱必须遵循“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的原则。实际上在我国,即便翻出有法律规定的,也找不到允许政府重奖某个市场主体的法律条文。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可以在法律和议会的授权下,在一些公益、公益事业方面投入和花钱,但对于企业这种市场主体或者个人的奖励,很容易造成不正当竞争,实际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是行政权力的越位,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相反,如果政府这样滥发奖金,又缺乏相应的监督,这种奖励很可能有官商勾结的嫌疑,极易滋生腐败。

政府滥发重奖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政绩思维在作怪,当政府想抓某项工作,就拿钱奖励,需要这方面的政绩,就在此处用奖励树一个典型。其实质是政府自己的一种政绩投资,或者说,是政绩工程的一种隐蔽的表现形式。

体制内奖:信任危机空前

说到奖,除了这种金钱和物质奖励,还有一些荣誉性的奖项,这些年,中国的奖项可谓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一些原本公信力很高,含金量十足的奖项或荣誉头衔,也在一片乱象中迅速烂掉。

鲁迅文学奖、金鸡百花奖,都拥有较长的历史,公众认同度很高,被认为是各自领域的最高荣誉。但这两个奖项近年来却负面新闻频出,公信力已大不如前,奖项的含金量在行内行外都已大幅下滑。

最近,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出炉,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奖。这位官员诗人一夜爆红,两首旧作《徐帆》和《刘亦菲》被网友命名为“羊羔体”,并认为这诗代表“回车键里出官诗”的时代终于来临,更有网友模仿其写作风格,写出一首以《车延高》为题目的诗。公众的恶搞,是对该奖的极大蔑视。

实际上,上一届的鲁迅文学奖也备受舆论质疑。据媒体报道,担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等人,同时成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有评论指出:“最耸人听闻的是,多达四个终审评委同时也是获奖者。”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评奖中,绝无仅有。

对于金鸡百花奖,韩寒的点评很幽默:“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金鸡百花奖到现在还在颁奖,我以为这些奖早就倒闭了。”这个曾经让亿万影迷热情参与投票的大众奖项,如今已经门庭

冷落,失去观众参与价值的金鸡百花奖,只不过是业内人士的一次自我狂欢与吹捧而已,好像和亿万观众无关了。

明码标价的信誉

如果说鲁迅文学奖、金鸡百花奖是在争议声中褪了色,含金量不如前,还有些奖项,则是在腐败中彻底崩溃了。

前些年我们经常看电视广告上、在食品包装袋上看到“国家免检产品”的字样,似乎是定心丸,表明质量信得过。这个荣誉头衔确实也算靠谱。不过自三鹿系列事件之后,人们发现,“免检”早已沦落为了“不检”和“不管”,最终,“国家免检产品”也从食品包装上被取消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国驰名商标”。去年底,《法制日报》披露了辽宁的一桩驰名商标造假案。辽宁某地多名法官、律师涉嫌与当事人串通,制造通过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假案。“你给我50万,我就把驰名商标给你弄来。”法院系统的一位专家做调研时就遇到很多代理人如此明确地承诺。

曾任湘潭中院民三庭副庭长的黄伟也提供“一条龙服务”,通过司法审判认定了多个中国驰名商标。

这些司法腐败直接造成了一些省驰名商标的认定数连创新高,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司法认定形成。就连许多当地人也闻所未闻的品牌,竟然一夜之间成了“中国驰名商标”。两会期间,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曾大声疾呼“驰名商标”出现欺世盗名,建议干脆取消。

什么样的奖才有价值

这些原本含金量很高的奖项为什么会烂掉?什么样的奖才有价值?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奖项的本质是什么。奖项是一种荣誉,其实质是一种社会信誉。在一个奖项背后,是信誉在支撑着它,信誉度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奖项的价值。

奖项的烂掉,其实质就是它背后的信誉体系的坍塌。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体系会坍塌呢?就是有人拿已经建立起来的信誉去做交易,去卖钱,一步步啃光了之前积累起来的信誉。没了信誉,这个奖项自然也就不值钱了,再拿去买,也卖不出个好价钱,因为公众不认



车延高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资料图片)

了。

有些奖项是政府设立的,在我国,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奖项和资格认定,都来自于政府。这些奖项的信誉,实际上是以政府信用作担保的。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公权力组织,本来是具有天然信誉度的,这是政府奖项的天然优势。

但政府机构主持的奖项也有天然的劣势,那就是腐败的威胁,政府机构的主事者一般任期有限,如果它手中的权力缺乏监督的话,这个奖项实际就成了无主财产,没有人会珍惜它。掌握权力的人就会为了私利去透支这笔财富,直到搞垮它的信誉。

来自民间或者某个企业的奖项荣誉,在权威性上高于政府的,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数不胜数。像民间企业一样,这些奖项的归属一般是清晰的,搞好搞坏都是他自己承担后果。民间奖项的含金量来自于自由竞争,谁都可以设立一个奖,但这个奖是否被社会认可,全靠自己去竞争,去积累信用。

比如每年的金球奖评选,由《法国足球》杂志主办,其权威性被普遍认为是高于国际足联的世界足球先生评选。还有《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榜、《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的汽车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民间机构自己评选的荣誉,都是该领域的头号权威。

钻石评级证书更不是开玩笑的事,目前公认的四大大证书 GIA、HRD、EGL、IGI,有政府的,也有营利企业的,都极具公信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讨论改革可能的结局,有人认为改革最糟糕的结局,莫过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打的是政府公权力的幌子,私下里做的是掌握权力的私利。这句话对于奖项同样成立,一个奖项最怕的就是,它利用的是政府的信誉,实际是被掌权者拿去私下的交易。这种计划市场两边都不靠谱的状况,是最糟糕的。

据《时代周报》



百花奖获奖图片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承认CPI超标 是求真务实的开始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9日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表示,估计今年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比3%稍微高出一二,这是国家发改委官员今年以来首次表态,称今年CPI可能高于3%。今年年初,我国设定的管理通胀预期将全年CPI增长控制在3%的水平。

承认CPI超标,势必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一旦超标,则宣告年初的既定目标未能实现,进而表明相关部门有失职之嫌。但凡洞悉现实语境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对官员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再艰难也应该承认,不承认,后果更可怕。

其实,CPI突破3%所带来的痛感,更具化到了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中。从“菜篮子”到“米袋子”,从“气坛子”到“油瓶子”,从“穿的”到“抹的”,从“吃的”到“坐的”,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翻着筋斗往上蹿。网友有这样段子:大蒜涨价——算你狠,绿豆涨价——逼你玩,汽油涨价——由你长,生姜涨价——将你军,白糖涨价——糖高宗,苹果涨价——凭什么……稻花香里说“疯”年,听取“涨”声一片。深圳市民还到香港打酱油,因为一瓶500毫升“李锦记”生抽在香港的售价折合人民币为5.95元,而在深圳超市的价格是6.6元;还有市民如此感叹,“一碗拉面都能吃出CPI温度,这钱包里的钱是越来越不经用了”,“以前还仅仅是‘房奴’,现在成‘菜奴’、‘饭奴’了,现在我们活着的,仅仅是为了能‘活着’。”至于其他更沉重的怨气和哀叹,更是让人不忍卒闻。

承认CPI超标,方是抵达真相之始。真相在不掺水的真实数据里,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在相关部门的实地调研里……如果CPI明明已经超标,相关部门仍然面不改色地否认,或者坚称仍是3%,这显然是不负责任。

承认CPI超标,天塌不下来。以往,不少官员陷入指标主义的漩涡不能自拔,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数字挺好看,但华而不实,轻轻一挤皆是水分。制造满是水分的数据,无论应付上级还是愚弄民众,都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激起民怨。承认CPI超标,老百姓才会心安,才能摆脱被愚弄之感,同时决策部门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CPI已经超标,接下来该怎么办?如何抚平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心中的创伤?我们看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方案,基层公务员收入与当地GDP变动乃至生活成本将实现匹配。对公务员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社会上的非公务员群体又该怎么办?他们如何才能跑过CPI?工资涨得比眉毛慢,物价涨得比胡子快,在这种困局中,决策部门更应该纾解困难群体的被剥夺感。

唯愿国家发改委的坦诚,能够刷新不少官员的陈旧思维,并形成一种制度性安排,即尊崇事实,实事求是,不遮蔽真实数据,也不给数据掺水。石川

“打黑局长”伸黑手

《钱江晚报》报道,施德扩曾先后任温州3个县的公安局局长,以打黑闻名,人称“打黑公安局长”。但同时,他又公然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坊间流传着他生活腐化的段子,被叫做“流氓局长”。施德扩因被检察机关指控在担任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分局局长期间受贿66万余元,在苍南县法院接受审判。

公安队伍中的打黑英雄堕落为黑手贪官的例子,据新闻报道的披露看来并非个别现象。平心而论,他们当初的积极打黑,或许也有身在其位不得不为的表演成分,或出于累积政绩以捞取继续向上的应得的动机,但不能否认多数人还是参与真打而且狠打了一批危害百姓的黑社会势力的,因而可以说是确实曾经为人民立过功的。但是何故会使时代的功臣沦为人民的罪人呢,倒是当今社会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不能排除极少数坏人混进公仆队伍的可能。但是即使是好人,假如被授予权力之后,既缺少自律的能力,又没有相应的管束这种权力的严密的制度,制约这种权力的广泛的监督,以及惩治滥用权力的严厉的手段,那么,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就是难免的结局了。

譬如这施德扩,腐败业绩中最大的一笔正是从私营企业中“搭干股”分红。明眼人一看即知,他所投“股份”,不是资金,不是土地,

不是技术,而是手中掌控的权力。以权力为企业主保驾护航谋取法外不当利益的同时,他也获得了丰厚的贿赂,同时将自己划入了腐败公仆的可耻行列之中,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有道是:“打黑局长”伸黑手,邪道放胆捞肥肉;可怜曾经英雄气,化作烟云逐水流。 吴之如 绘



对明星任团副之思考

有消息说,国家民委正式任命腾格尔担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几乎同时,陈思思也升任二炮文工团副团长。相比前两位的喜事临门,本月初范冰冰因近年工作出色将继续担任西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却引来了不少争议。有评论认为,一个一年只开了几次会的副团长,还是一个称职的副团长吗?(《重庆晨报》11月10日)

我不清楚当下是否正值文艺团体集中换届选举,还是有关文艺团体不谋而合联手推出的“合并同类项”明星新闻。对这三位新任和续任的明星团副以及此前更多的明星副县、副厅现象,尽管坊间和网民七嘴八舌“瞎嚷嚷”,左看右看,右观不服,但我觉得,叫好和不好好都无所谓了,因为,明星做官早已见怪不怪了,似乎谁也干预不了,你还穷嚷嚷什么?

然而,即便干预不了,作为一个哪怕是很无奈的“看客”,如同莎士比亚说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五味杂陈的观后感还是油然而

生的。有人说,现在社会已经进入“灰色时代”,对很多事物的判断臧否不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黑与白的调和色——灰色。对明星团副之“乱炖”性思考似乎也照此推论。

明星做官有错吗?我觉得,至少没大错,符合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等用人“硬杠杠”。既然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为何不能演(唱)而优则仕?难道让一个农民劳模去领导一群演唱业务精的团队抑或让这些明星演员去当乡镇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星做本行业的官没错。尽管有的明星有这样和那样的“绯闻”,但无碍升迁。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想用人,那就是虽然有缺点但是更有优点的思维逻辑;不想用人,那就是虽然有优点但是也有缺点的思维逻辑,这都不重要。

明星只做团副意味着什么?这几家文艺团体的“集体换届”全部任命的是明星“团副”,妙就妙在这儿:对用人单位来讲,有个明星团副,既可以大大

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

现在很多人都是“相识满天下,知心无几人”,没真朋友的生活成为生活的常态。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01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77.9%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真正的朋友很少,其中6.7%的人表示自己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仅1.1%的人表示身边的知心朋友“非常多”。受访者中,“80后”占49.9%，“70后”占33.3%。(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朋友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彼此有交情的人。生活中,很多人的交心朋友、贴心朋友不是刻意交来的,而是遇到的,是由志趣相投、性格相合等因素促成的。人谓知己难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代人交友方式有很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往往是凭借运气。

朋友方式,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情感模式。真朋友所对应的另一个词语是假朋友,即假模假式的朋友、假心假意的朋友。假朋友也是交来的,有时候还是以假换假。交友不从真情考虑,不尽心换心,而是把现实利益作为首要考量,交到朋友,绝不会是真正的朋友。由利益换来的友情,就像是暗中的一把刀,利益不再,它会随时随地割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为纽结,其相互利用的关系中不存在真情,它只有庸俗社会学里的套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结交交友是件很感性的事情,需要有判断力、辨别力,还要确认自我角色和自我认同。朋友关系有深有浅,既可做莫逆之交,也可听信孔子,对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情无义之人不会有朋友,朋友是一句温暖的话,一杯醇厚的酒,一段人生的记忆。“朋友有信”,无信不立,无信就不会有朋友。无疑,现在的社会缺乏利他精神,多的是自利的狡猾、狡诈。利他主义是朋友关系中的一种既常见又可贵的东西,一个人只有在乎乎朋友的感受,付出自己的真心,才可能得到对方的真情回应。所谓患难见真情,就是真挚待友,同悲同喜,一起承担。朋友是一种社会资源,但它不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资源。那些钻窟窿打洞所结交的官场朋友、生意场朋友,看似对自己有帮助,有的也具有实际性的帮助,但这些朋友不是不牢靠的朋友、无用即弃的朋友,就是见利忘义的朋友、翻脸不认人的朋友。交友不慎,常是酿成个人生活悲剧的根源。狐朋狗友、酒肉朋友,所构成的是一些人的交友方式,还是他们所选的择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认错友、交错友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自己。

一切向钱看,一切以利益为取舍标准,交友多从自身考虑,所折射的是近些年来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和人际关系的变异。朋友一词在这个时代被滥用,纯粹的友谊、纯正的友情难觅踪影,是一种不堪承受的生命之轻。它是一个社会学、伦理学所要研讨的主题,亦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人生与社会悲剧。

今语